

梅兰芳戏曲内外的人生

甄光俊

【把国粹带向世界】

梅兰芳,1894年出生于北京,祖籍江苏泰州。出身梨园世家的他,自幼便深受京剧艺术的熏陶。梅兰芳出道时,恰逢京剧艺术发展的鼎盛期,他在艺术的海阔天空里广征博采,不仅演出从前人那里继承下来的大量传统剧目,一字一腔、一招一式恪守师承,还尝试编演了数量可观的古装新戏、时装新戏。与此同时,他非常注重从各种姊妹艺术中汲取养分,在表演上不断推陈出新。

梅兰芳对京剧旦角的唱腔、念白、舞蹈、音乐、服装、化妆等各方面都有所创新发展,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。1927年,北京《顺天时报》通过公开投票评选的方式,推出了京剧旦角前四名,梅兰芳荣获“四大名旦”之首,从此开宗立派,被公认为引领京剧乃至其他地方戏曲发展走向的表率。

梅兰芳在剧坛迅速崛起,不仅享誉大江南北,还引起国际戏剧界的高度重视。日本的戏剧权威人士于1919年、1924年两度邀请梅兰芳赴日演出,中国的国粹艺术在当地大放异彩。此后,梅兰芳又应美国、苏联文化机构的邀约,分别于1930年、1935年赴美、苏演出,一鸣惊人,中国的京剧艺术得以在欧美大地广泛传播,其影响源远流长。

梅兰芳在国外的影响力可以通过一次“讹传”得以体现。在中国人民奋起抵御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抗战时期,梅兰芳隐居上海,蓄须明志,拒绝参与粉饰太平的演出。1941年的一天,闭门谢客的梅兰芳,突然接到苏联塔斯社驻上海记者的电话,邀请梅兰芳给他5分钟的时间,进行一次会面。半小时后,这位记者登门拜访,他紧紧握住梅兰芳的手,上下打量着说:“好,梅先生身体这样健康,我放心了!”梅兰芳不明所以,连忙询问发生了什么事。来客笑着说:“我接到总社从莫斯科发来的电报,外界传说您逝世了,所以指示我了解实际情况。现在我见到您本人,马上就给总社回电,让他们放心。”说完便与梅兰芳握手告别。

1949年,梅兰芳到北京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,有机会见到塔斯社的罗果夫,从他那里得知了1941年那次事件的原委。原来,那个传闻是从苏联驻重庆使馆传出的,说中国有一位最著名的京剧演员逝世了,但未指明是谁。当时抗战形势紧迫,情况一时难以核实;又因梅兰芳几年前访苏演出,给苏联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,所以苏联国内许多人猜想逝世的是梅兰芳。于是,苏联戏剧界、文艺界筹备召开追悼会,组织纪念梅兰芳的活动。最后,当苏联国内接到塔斯社记者发回的已见面梅兰芳的消息后,大家才放下心来。梅兰芳得知原委后,对苏联文化界朋友的关心十分感激,他当即撰文,通过《人民日报》向当年关心他的苏联友人表示感谢。

梅兰芳十分感念自己率团赴美、苏演出时的艺术总指导张彭春教授。当时,他出国演出的开幕词、讲稿及译稿,均出自张彭春之手,这些文字宛若桥梁,搭建起外国观众与京剧艺术之间的文化联结。演出期间,张彭春还实时研究梅兰芳的表演艺术,并向梅兰芳建议:外国人看戏,最忌讳演员在大幅度的表演中走直线,走弧线则更易被接受,从美学角度审视舞台艺术,圆的线条才更具美感。张彭春还提出了净化舞台的一系列建议,如废除检场人进入表演区为演员送水饮场的陋习;武打和技巧表演,不能为显示技能而脱离剧情;京剧的剧本应力求精练、集中,减少交代性的场次等。这些主张在当时并未被京剧界普遍接受,但梅兰芳认为颇有道理,并在实践中积极吸纳,取得了良好的效果。

梅兰芳回国后,在其撰写的《梅兰芳游俄记》中称赞张彭春:“对内对外无不措置裕如,对中国的戏剧艺术有独到的见解。我能在艺术方面有那样的收获,是和张先生的辛劳分不开的。”1936年10月,为庆祝天津中国大戏院落成,梅兰芳受邀到该院献艺。在繁忙的演出间隙,梅兰芳偕同刘连荣、徐兰沅、杨盛春等艺友,到南开学校看望张彭春。张伯苓校长在校友楼备下茶点接待众人,席间宾主叙谈甚欢。梅兰芳向张伯苓当面夸赞:“干话剧的朋友真正懂京戏的不多,可是,张彭春先生却是京戏的大行家。”那天,梅兰芳一行由张彭春、黄子坚陪同,还参观了南开校园、花坞、礼堂,并在礼堂内合影留念。

京剧大师梅兰芳长期在戏曲园地辛勤耕耘、奋力开拓,以自己的艺术实践把戏曲旦行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。其影响所及不仅限于京剧一个剧种,百余年来,“梅兰芳体系”作为一面旗帜,已然成为近现代中国戏曲艺术的总代表,始终引领着戏曲队伍的整体发展方向。

【与人交往处见人品】

梅兰芳自幼学戏,未进过学堂读书,成为职业演员后,为了弥补这一人生遗憾,他抓住一切机会到社会各界名师访友。梅兰芳认真学习书法、绘画,研习西洋音乐和狐步舞蹈,力图以全面的文化修养,涵养完美的人格。

20世纪30年代的一天,上海复旦剧社首场演出话剧《鸡鸣早看天》。开演前,坐在观众席上的剧作者洪深,突然发现前排观众纷纷回头张望,有人还站起身来向后招手。他以为是向自己表示敬意,便礼貌地站起身,脱帽向人群致意,可人们仍目不转睛地向后招手。洪深回头一看,发现梅兰芳坐在那里,他这才明白,人们是在向梅兰芳表示敬意。原来,一向虚心好学的梅兰芳听说复旦剧社上演新剧,便化妆悄悄前来观看,不想还是被眼尖的观众认了出来。当时,他若走开,是对向他致意的观众的不尊重;不走,又担心搅乱台上的演出,左右为难的他倍感窘迫。事后,梅兰芳托人向洪深诚挚道歉,此后便不再轻易到剧场观看演出。

梅兰芳对同业中的长辈,平辈甚至晚辈,始终谦和有礼。李世芳(京剧“四小名旦”之一)当初拜梅兰芳为师时,按照戏班的习惯向师父行叩首礼,梅兰芳连称“不敢当”,再三婉辞,声称彼此应以师兄弟相称。这并非表面

的谦虚,1942年印行的《李世芳专集》中,收录了1937年8月梅兰芳写给入室弟子李世芳的一封信,抬头称“世芳贤弟”。

全民族抗战期间,梅兰芳在上海的家中教李世芳演戏,在对一些表演细节的处理上,他多采用启发或商讨式的教学方式。有一次,梅兰芳在剧场里看李世芳演《霸王别姬》,发现他“舞剑”时有一个动作,临场发挥比自己所教的更为精妙。演出结束后回到家,梅兰芳让李世芳把那个动作再表演一遍,然后真诚地对他说:“这个身段安得好,往后就这么演。”事后,梅兰芳还将这个表演动作运用到自己所演的《霸王别姬》中。当时,弟子在演出时对师父所教戏路擅自发挥,会被认为是大不敬,然而梅兰芳对此不仅不怪罪,反而大加鼓励,展现了令人肃然起敬的胸襟。

梅兰芳待人接物始终彬彬有礼,在家里会见客人,十分讲究衣着得体,即便是盛夏时节,也从来不脱衬衣,衣扣都扣得整齐严实。客人告辞时梅兰芳必定送至门外。

1930年梅兰芳访问美国归来后,深感在了解外国文艺或与外国友人交往时,不懂外语多有不便,遂决定聘请家教,学习英语。不久后,梅兰芳搬到上海马斯南路居住,每周二、周四下午3点钟,必有一位白发苍苍的英国老太太来到梅宅,为梅兰芳讲授两个小时的英语。梅兰芳每次都事先整装等待,并提前两分钟从楼梯上走下来,迎接老师进入书房。在学习的两个小时里,梅兰芳概不会客。他还时常教导子女,要像那位英国老太太一样守时,上学要注意着装整洁,以此表示对老师的尊敬。

【坦然面对赞扬与批评】

京剧艺术形成后之所以能迅速兴盛,与热爱这门艺术的知识分子参与指导有着密切的关系。

20世纪20年代初,梅兰芳与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胡适在北京相识,彼此有过礼节性的交往。那时,胡适因忙于北大的教学工作和新文化运动,只是偶尔到梅兰芳的“缀玉轩”小坐。20年代末,胡适担任中国公学校长,常住上海,此时梅兰芳也迁居沪上,二人的来往日渐增多。在《胡适日记》中,就有关于与梅兰芳约见并帮他挑选赴美演出剧目的记载。

1930年上半年,梅兰芳赴美国演出期间,旧金山欧内斯特·K·莫编篡了一本名为《梅兰芳太平洋沿岸演出》的英文专著,评介京剧和梅兰芳的表演艺术,打头文章《梅兰芳和中国戏剧》的作者即为胡适。文中,胡适称赞梅兰芳“是个勤奋好学的学生,一向显示要学习的强烈愿望”“是一位受过中国旧剧最彻底训练艺术家”。胡适特别指出,梅兰芳周围的朋友,近年来为他“创作不少以他为主角的皮黄剧目”,如《千金一笑》《木兰从军》等,“他的一些新剧会使研究戏剧发展的人士感到兴趣”。对于胡适的支持和帮助,梅兰芳深表感激,回国后亲自到胡适家中致谢。

当然,梅兰芳作为公众人物,收获赞扬的同时,也必然会面对批评,这里便要引出鲁迅与梅兰芳的一段“交集”。

鲁迅曾发表《论梅兰芳及其他》(上、下两篇,收入《花边文学》集),以严肃的态度,对梅兰芳艺术风格的“由俗到雅”提出了尖锐的批评。鲁迅写道:“他未经士大夫帮忙时候所做的戏,自然是俗的,甚至于猥下,肮脏,但是泼刺,有生气。待到化为‘天女’,高贵了,然而从此死板板,矜持得可怜。看一位不死不活的天女或林妹妹,我想,大多数人是倒不如看一个漂亮活动的村女的,她和我们相近。”可见,鲁迅不认同梅兰芳的艺术风格日渐受士大夫影响的转变,认为其表演不如早期那般“泼刺,有生气”。鲁迅还将梆子演员侯俊山(“老十三旦”)演出时“满座还是喝彩”的场景,与梅兰芳演出“近来颇有些冷落”的状况作对比,奚落之情溢于言表。

对于梅兰芳访苏前,有学者建议他作“剧本鉴定”,称“因为参照,到苏联去的艺术家,是无论如何应该事先表示一点‘转变’的”,鲁迅更是不以为然,直言:“梅兰芳先生正在说中国戏是象征主义,剧本的字句要雅一些,他其实是为艺术而艺术,他也是一位‘第三种人’。”所谓“第三种人”,在当时专指表面上超然中立,实际却站在反动阵营一边,客观上为反动阵营说话的一股势力。从后续的历史来看,鲁迅将梅兰芳评价为“第三种人”有失偏颇,但他对当时文艺界脱离群众、曲高和寡倾向的揭露,却可谓一针见血。

对于鲁迅的批评,梅兰芳始终保持沉默。他将鲁迅的批评当作一种鞭策,也作为对照自身行为的一面镜子,下定决心做好自己的本分,功过则交由后人评说。

【艺韵长存大师远行】

1925年,梅兰芳购置并搬入北京东城无量大人胡同(今红星胡同)的私宅。20世纪30年代初,梅兰芳将这座房产变卖,举家迁居上海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梅兰芳返回北京,出任中国戏曲研究院院长。周恩来总理考虑到便于梅兰芳的生活和工作,打算安排他迁回无量大人胡同的旧居。梅兰芳听说后,深表感激却坚辞不受,他说:“那座房子是我卖掉的。今天,我不能借着共产党的力量再把它收回来。请政府随便给我安排个住处吧。”就这样,梅兰芳住进了北京西城护国寺大街9号院,直至1961年逝世。

1959年,各地戏曲界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,精心筹备向国庆节献礼的剧目。梅兰芳率领梅剧团将河南豫剧《穆桂英挂帅》移植改编为京剧,为京剧艺术注入了新鲜血液。这台戏的演出大获成功,成为梅派艺术的又一部经典之作。之后,梅兰芳马不停蹄,紧锣密鼓地策划根据《柳毅传》改编的新剧《龙女牧羊》,并与剧作者先后沟通了10余次,从剧情构思到表演设计都作了周密安排。

令人惋惜的是,梅兰芳因常年超负荷工作,自1960年初冬便感身体不适,在改编《龙女牧羊》的过程中因体力不支,宣告创作暂停。1961年七月底,梅兰芳因心绞痛住进医院,8月8日,中国剧坛的这颗璀璨巨星就此陨落,年仅67岁。消息传出,举国上下无不扼腕痛惜!

(作者为天津市文史研究馆馆员)



历史随笔

聚散有道 成败有因

清风慕竹

北宋乾德三年(965),宋太祖赵匡胤在皇室内设立了一个金库,取名封桩库。彼时宋朝正在进行统一战争,平定后蜀后,宋太祖下令将从四川收缴的金银铜钱悉数存入此库,这成为封桩库的第一笔重要收入。随后,宋朝陆续攻灭南唐、南唐、吴越等多个南方割据政权,这些富庶政权的府库积蓄,都源源不断地充实到封桩库中。为让封桩库拥有稳定的收入来源,宋太祖又规定:凡三司掌控的国家财政,岁终盈余皆纳入封桩库。

对于帝王的封桩库,世人早已见怪不怪,皆认为这不过是皇帝的私人“小金库”,图的是花钱便利。然而一日,宋太祖对身边一位亲近大臣谈及建立封桩库的初衷,他说:“石敬瑭割幽、燕地区以赂契丹,使一方土地沦于国境之外,朕甚为怜悯。欲待封桩库积满四五百万缗时,遣使者与契丹商议,倘若肯归还土地,便用这些钱财酬谢;若不肯,我则以二十四万缗购一胡人人头。契丹精兵不过十万,仅需耗费二百万匹绢,胡虏便可悉数剿灭。”

大臣们听罢,这才恍然大悟。他们深知,宋太祖向来出手阔绰,对金钱从无吝啬之心。他未发迹时,曾游历关中,生活时常窘迫,然而对于他人的周济,他向来有选择地接受,一旦手中有钱,必定分赠他人。用《画履录》中的话来说,便是“有百钱之余,必有与人,人颇异之”。及至他建功立业登基为帝

后,更是不以金钱为意。他命王全斌领兵伐蜀,出征前叮嘱道:“凡攻克城寨,仅登记兵器甲冑与粮草,财物币帛尽数分给将士。朕想要得到的,唯有蜀国的土地。”

散尽千金的宋太祖,其治下的大宋愈发富庶,疆域也不断拓展,最终成为统一的王朝。而历史上也有人反其道而行之,结局自然不堪设想。

王莽篡汉,建立新朝。登基之后,王莽也开始营建自己的小金库,他对小金库的管理极为严苛,每一万斤黄金贮藏为一匮(匮,即柜),积满一匮便封柜贴条,严禁擅动。王莽的财富积累极快,皇宫内帑已然容不下,便在黄门、钩盾、藏府、中尚方等官署另设库房堆积黄金。

王莽能聚敛如此巨额的财富,秘诀便是只进不出,当然供自身享用的花费除外。

新朝建立之初,王莽大封功臣,诸多功臣皆晋爵受封,却迟迟不令他们前往封地就任,借口是封地的疆界尚未划定。被催问得急了,王莽便让人取些泥土赐给诸侯,说:“这便是你封地上的泥土,好生珍藏,定不会有误。”他许诺给手下官吏的

俸禄十分优厚,定例为:公,每年八十万钱;侯、伯,四十万钱;子、男,二十万钱。可这些俸禄,官吏们从未真正领到过。

在王莽眼中,能为他敛财的,方为能官,否则便是庸碌之辈。冀平郡连率田况上奏称:“郡县对百姓估算财产不实,导致赋税大量流失。”这立刻引起王莽的高度重视,他随即下令按三十税一的比例,在原有赋税基础上再增收一次。王莽认为田况忠心忧国,将其爵位升为伯,赐钱二百万。王莽准备任命大司马司农费兴为荆州牧,临行前召见他询问施政方略,费兴答道:“荆州、扬州的百姓大多依靠山泽资源,以捕鱼、采集为生。此前国家设立六管之制,征收山泽之税,损害并侵夺了百姓的生计。臣到任之后,将颁布政令晓谕盗贼,让他们回归田间,借贷犁、牛、种子与粮食给他们,放宽租赋要求,希望借此能让盗贼四散归农,得以安枕。”王莽听罢勃然大怒,费兴尚未动身赴任,便被罢官。

新朝后期,各地起义风起云涌,诸多起义军逼近都城长安,形势万分危急。王莽任命九名将军,皆以“虎”为封号,号称“九虎将军”,命其镇守京城。有大臣劝谏王莽,让他拿出小

金库的钱财犒赏将士,将士们必定会拼死效命。王莽却哭穷道:“朕哪里还有钱财,这些年战事不断,钱财早已悉数耗在军饷之上。”最终仅赏给九虎部队的每名士兵四千钱。在物价飞涨的乱世,四千钱不过能买几个馒头,士兵们得知后,士气瞬间涣散。

结果不言而喻,起义军攻破长安,王莽死于非命。最令人震惊的是,起义军打开皇室内帑后发现,王莽的小金库中仅黄金便有六十匮,贮藏在长乐御府、中御府、都内、平准库中的钱币、绢帛、珠宝等财物,也堆积如山。

从古至今,一个人对待金钱的态度,投射了这个人是否懂得尊重他人、分享利益、承担责任。故而有人钱散人聚,有人钱聚人散,而人生的成与败,便藏在这一聚一散之间。

